

第一章 红与绿：

旧政治还是新政治

1. 红绿之争

十年前，一位朋友让我给由他发起的一个“地球之友”的地方集会做演讲。我的兴趣是绿色哲学的历史基础，因而，我为听众讲解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皮特·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人的思想。坦率地讲，在接下来描述这种历史联系的讨论中，我做好了接受称赞的精神准备。但是，我所感受到的却是一些人带有敌意的反感。他们感到非常失望。是我没有意识到绿色分子正在讨论的是以前从未讨论过的东西吗？还是我没有意识到它与传统政治的明显区别？

我冒犯了绿色精神的一个根本性方面，它认为，生态主义实际上是关于一个世界新秩序和一种新的“生活政治”的（借用绿党的标语）。在《现代环境主义的根基》中，我由于建议绿色分子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吸收到他们的分析中来而加重了这一

“过错”。这是一块面对着绿色公牛时的红色遮布，它正在由于是“来自那些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的陈腐思想家的太多愤怒”而被拒绝考虑。^[1]

尽管这种习以为常的批评，作为那个“邪恶势力”即马克思主义左派中一个“已经过时”的思想家和成员^[2]，我打算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努力拓展与深化红色立场和绿色立场之间近来就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而展开的争论。这是因为，我不同意艾德里安·阿特金森（Adrian Atkinson）的做法。他将其贬低为这只是两种观点之间的一种“辩论”，而在实践中没有显示出根本性矛盾。

的确，在红色的绿色分子和绿色的绿色分子之间存在着许多联系（这些术语同时用来描述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或“生态中心主义者”以作为“浅层的”绿色分子或“环境主义者”即技术中心论者的对立面，而他们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参见第二章）。然而，如果说红色的绿色分子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那么，绿色的绿色分子则更多地受惠于无政府主义。而且，尽管这两者经常在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中合而为一，它的要素组成了现代生态乌托邦和默里·布金（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的一个模板，但二者之间也存在重要的——有可能难以调和的——区别。

在激进联盟和红绿网络目前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托尼·本（Tony Benn）给出了原因：

直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平等、民主、责任、国际主义和道德）得以重建之后，人们才能真正建立起他们与由于这些原则的优先性而分裂的运动的非机会主义的真正联系。^[3]

我认为现在是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了，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这一个过程——一个并非只具有学术重要性的过程——做出贡献。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了危机，危机的影响比从前更大程度地扩展到了全世界。与此同时，经济衰退和紧缩已经使老中心地带的制造业大伤元气，而人们顽固地拒绝承担走出萧条状态的代价，资本主义的回应是更深入地进入第二、第三世界以寻求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料来源。

目前寻求建立的一个新的、更“自由”的关贸总协定（GATT）代表着一种把每个人都带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努力。这蕴涵着一个既非社会主义者，也非绿色分子所希望的社会——一个有着较高水平商品产量和较低水平人类需要满足的、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进一步膨胀。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政治上无权 and 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地被边缘化，并且实现利润增长的环境成本也越来越大。但是，由于这些问题植根于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现存根源，不存在从根本上加以分析与解决希望，社会不公正和环境退化这两个祸害即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它们的存在，也仍将继续扩大。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高峰会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尽管某些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和其他杰出的政治人物都已正确地认识到这些难题和它们产生的原因，西方领导人顽固地辩护跨国资本继续以同样的旧方式运作的“权利”，并提出陈旧的马尔萨斯（第三世界）的“过度人口”论调作为他们对产生原因的解释。在面临起草全球协议、条约和其他协定以采取应对社会与环境难题的根本性行动时，他们都大打折扣、推诿甚至直截了当地拒绝签署这些文件，或者更不诚实的是，他们虽然签了字，但回家却依然按照旧政治行事。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左翼和绿色分子都期待着他们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而这并没有发生。左翼分子 20 世纪 80 年代在几乎全世界的混乱状态已经得到广泛描述，而向我们承诺用一种“新政治”来代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绿色分子也正在走向衰弱。20 世纪 80 年代初，绿色分子在欧洲获得的选举支持已大幅度减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英国绿党正面临着危机，执行理事会中有一半人辞职，而成员已从 1990 年的近 20 000 人下降到 1992 年的 10 000 人。^[4]

既然现实主义但“安抚性”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绿色改良主义都未能构成对现状的一个严重威胁，更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绿色分子重新主张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更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尽管探索性的红绿联盟仍在继续，迄今为止，在那些正在进行的试探性的红绿运动“网络”中，还没有非常有力的、有效的、连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出现。我认为，这是由于以下事实造成的，即要把红色和绿色运动团结起来，就必须有效地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联合起来。无政府主义是比其他任何传统政治哲学都更强烈影响绿色运动的一个主义。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容易，因为，与大众化的错误观念不同，把无政府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并非总是可能的。本书试图通过描述和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它们必须依其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来推动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本书着重强调和澄清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不同，目的是为未来任何试图填补二者之间的鸿沟并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更重要力量的政治著述提出议程。它通过如下主张实现这一目标：建议绿色分子通过放弃那些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及后现代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方面而

更好地与红色分子协调；与此同时，红色分子通过复活那些我在本书描述与评论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与绿色分子协调。这些传统包括非集中主义、社会自然辩证法以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某种程度复活和对重新发现我们作为生产者力量的强调。

笔者在本书的主要部分即第三章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观点为绿色分子提供了比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透彻的分析更多的东西，尽管后者也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上的一种辩证观点，这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者和技术中心主义者的看法而是同时挑战二者。马克思主义持一种社会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后者应当贯穿于绿色战略。正如在前文中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而且，像我主张的一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以至于足以坚决地主张：自然的权利（生物平等主义）如果没有人类的权利（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

许多绿色分子，比如舒马赫 E. F. Schumacher 曾认为^[5]，马克思主义是刻板的、不灵活的、决定论的、机械论的（而不是有机论的）历史观点过分“科学化的（在实证主义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缺少人性主义与精神向度，是一本包含一系列大多数被证明为错误的和在前瞻与含义上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预测的圣经。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表明，这些批评通常是部分或全部错误的。下文也许可以阐明这一点，虽然它不是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缺点的辩解。正如萨卡（S. Sarkar）所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发现真正的马克思……目的不是为了拯救马克思主义，

而是为了发现真理... ..”^[6] 乌尔里希 (O. Ullrich) 指出：

现在已到了最终抛弃用无休止的引经据典代替对新现象和个人思想的分析这一无聊游戏的时候。而且，这种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本人不喜欢被叫做马克思主义者。从教条地遵从他大约一百年前所写内容的意义上说，他在今天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7]

我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第四章中概括了无政府主义的信条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贯穿着我所说的主流绿色分子（生态中心论者）和那些公开声称自己是“绿色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尽管我在结论（参见第五章）中将不会主张必须抛弃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我仍强调社会主义的与众不同及其它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主张生态中心论者的重点应转向后者。某些绿色分子可能回答说，这种转变已经发生，但我怀疑的是，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种转变的全部含义，诸如对一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经济或生物中心主义观念的放弃？

在此之前，我想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论述这些争论的相关背景。许多学者比如阿特金森、布拉姆威尔 (A. Bramwell) 和多布森断言，生态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如果不大幅度地加以改变，政治生态学纲领中的描述性和规定性因素就不能在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比如社会主义）内部适应生存。对多布森来说，这种特征尤其取决于生态主义对增长的极限和生物道德的接受（倡导对“非人”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尊崇和敬畏——依据其本身的权利而不是对人类的有用性）。^[8] 阿特金森认为，这是种生态主义的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乌托邦社会主义之后的）。他指出：

自然权利使生态主义成为一个十分不同于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的政治范式，而后三种政治意识形态通常被认为是决定着目前政治图景的边界。^[9]

所有这些都是存在争议的。首先，现今很少绿色分子没有提出他们的未来经济增长形式，尽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一论据本身在理论上是成问题的（参见第三章第五节）。其次，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性论证、它的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然是否赋予本身以价值，我们作为人类只能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谈论自然）^[10]以及它试图建立一个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趋势（参见第三章第六节）。再次，从狭义上说，主张现代政治中没有乌托邦主义可能是正确的，但就其根基而言却并非如此。从至少拥有对一种理想（无政府—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基本原则的看法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乌托邦的。但就我们应如何改变社会而言，前者不是乌托邦，而且，它公正地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绿色分子及其论点。（参见第三章第九节）

我不想在这里纠缠这些异议，并且我承认，绿色政治对它在描述性因素方面有自己特色甚至新颖性的声称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认为，绿色政治在其规划性要素方面，即在它如何建议改变与组织社会方面，通常只是对一些非常陈腐的和基本的政治问题的陈旧解决方案进行了翻新。这本身并没有错，但翻新需要是内在连贯的，而绿色分子普遍认识到，这种内在关联性目前是缺乏的。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某种重视能够使生态主义获得一种内在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适合于一种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无政府主义的进步因素一起，可以使绿色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不像以前的一些

“社会主义”那样过于倾向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尽管像在结论中认识到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仍将导致牺牲某些现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但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情。在我看来：

归诸于‘社会生态学’或‘生态学范式’的政治思想的确来自于，而且只能依据其进行讨论的政治传统和争论（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竞争对合作、权威与等级制对自由与平等），即它们远远早于作为科学学科的生态学的出现。^[11]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从简短地概述这些争论的内容开始（参见表 1.1）。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仍决定着 21 世纪的基本政治议程，一种绿色意识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它们构成了绿色政治发展难以回避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些争论都有很多话要说。

表 1.1 传统与绿色政治争论中涉及的某些基本社会问题

第一章中讨论的问题

人性：人性存在吗？它是由环境还是由基因继承决定的？它是贪婪的、侵略性的和竞争性的，还是相反？

决定主义或自由意志：个人和社会是外部力量——上帝、环境或经济——的产物吗？或者，他们是否有按照其愿望改变世界的自由？

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社会和经济是由那些劝说人们以不同方式行动的新观念和论点所决定与改变的吗？或者，物质尤其是经济结构和事件是对人们行为与观念的主要影响因素吗？

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社会变化是由改变其生活风格与思想的个人（往往作为消费者），还是为了政治效果的集体行动（往往作为生产者）的团体发动的？

认知共同体或利益联合体：社会仅仅是一个相互支持其利益的个体的集合，还是有着大于个体总和的东西——社会是一个个体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它的存在吗？

协商一致或冲突：哪一个构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社会是一个由国家来代表所有团体间利益的平衡的真正民主制吗？或者，它是由其利益与多数人相冲突的少数精英（经济的或其他的）主宰的吗？

(续表)

结构主义:社会事件或个体与集体的行动是人们心理的、文化或经济组织中潜意识或隐藏结构的结果吗?或者,我们很容易承认的我们周围的东西就是社会现实的全部内容吗?

发展:区域和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最好由环境决定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等模式或它们的混合来描述?哪一个发展模式在生态意义上是最值得期望的?是独立发展(生物区域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平等主义:我们应该导致产生大规模财富不均衡,然后忍受它或减缓这些负效果的经济发展吗?或者,我们应当促进一种根本不允许不平等产生的模式?所有的生物种类都应平等对待吗?

自由市场或干预:哪一种能为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社会和环境需要可以在没有计划和对市场干预的情况下满足吗?后者会阻碍更新并导致低效率吗?

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权威或自由意志论:一个和平的、公正的、自我实现的和愉悦的社会更可能来自于一个由国家或精英团体主宰的等级制实现的高度命令与控制的体制,还是等级制和国家的缺失、民主自治的促进是这样一个社会的关键?

小或大规模: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和政治经济组织是实现期望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吗?还是,小的才是美好的?

技术被决定论或自决:社会或者其中的具体因素控制和决定技术发展呢?还是后者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

高技术或适度技术:何者服务于一个社会公正的和生态健康的社会?前者可以表达并成为民主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吗?后者可以满足大规模人口的基本需要吗?

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通过理解与确立一般理性原则(包括一种绝对道德)寻求普遍利益的启蒙运动仍然是有效的吗?或者,生活应该遵循现时享受的享乐主义原则、图像而不是现实和所有看法与观点的平等有效性?

应该承认,接下来在第一章第二节中的讨论仅仅是解释性的。它并不是为了详尽列举传统政治下的所有重要问题,因而

我不再抽象地争论赖尔 (M. Ryle) 的权威 / 等级制对自由 / 平等的二元论 或者与技术 它应是“ 硬的 ”或是“ 软的 ”、高度的 “或是“ 适当的 ”,它是否决定着社会发展还是相反 和规模 规模经济或是“ 小的就是好的 ”相关的议题 或者政治手段应该是改良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的。有人会认为我应该做这些,因为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关于生态学的现代争论中,因而也将必然出现在第三章、第四章关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然而,为了限制本章的篇幅,我选择了一些并未公开地出现在绿色争论中,但我认为应该讨论的议题。我也必须承认,尽管它的一大部分是按照冲突性的二元论来叙述的,这些议题通常要比那复杂得多。某些绿色分子也许会批评说,这种使议题极化的过程正是难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解决方案。他们说,二元论思维构成了“ 启蒙计划 ”(Enlightenment Project 即所有那些从自 17 世纪以来逐步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科学发现和哲学进步中不断演进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目标)的基础。而且,正是这种计划和二元论思维毁灭了我们——尤其是社会和自然二元化的趋势,例如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和对立的。虽然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可信的,但这种论点确有许多。尽管如此,我发现二元论思维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教育学方法:我们可以经常利用简单的——甚至过于简化的——二元论思考来加强对复杂与多重议题的理解。它们提供给我们一个立足点,我们可以由此提升我们自己并最终达到对复杂现实的深层理解。既然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和其他有兴趣的人熟悉这些争论,那么,我能够帮助他们知道得越多就越好。

在论述了传统政治问题并非与绿色关切无关之后,我将在第二章中进一步指出:生态主义采取了借鉴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传统理论的观点。我还将阐明,生态主义为什么是与其他

政治意识形态相关的，包括马克思主义。

所有这些意味着，我必须拒绝阿特金森令人吃惊的论点：“一种一贯性的政治生态学不是对任何特定欧洲智力传统的否定而是对这一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否定。”^[12]（尽管他断定全盘拒绝马克思主义将会是一个灾难）我也不赞成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计划”目标的反对，虽然它看起来迎合了如此多绿色分子的要求。我同意，那些通过理性、科学、工业和社会公正达到人类进步的总体目标必须注入一种生态的意蕴。这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但我也怀疑它能够以一种自给自足的（例如分散化的）、生物区域发展的模式中出现。其中，除了那些针对自然的之外，所有其他的道德观和经济学都被看成是完全相对的和同样有效的。然而，我认为，已经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一起构成一个少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能够在试图解决“生态危机”过程中提供许多教益。它可以成为激进地重塑社会的同时又能避免每一个人失去那些在“启蒙计划”的资本主义阶段某些人已经得到的诸多好处的关键。

2. 某些旧政治问题

人性

人的本性是进攻性的还是温和性的？是竞争性的还是合作性的？是自私性的还是给予性的？你所得到的任何答案几乎可以肯定都不是在科学上有效的，它们只能是在一定时空内对大多数人是什么和从根本上说像什么的一种判断，而且只能建立在对很少一部分人观察的结果之上。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永远不能恰当地证实一种“普遍的”人性观点，同时还因为，要把先天

获得的特征“天性”与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特征“教化”分离开来，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因此，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认为答案能够找到并且是重要的。英国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佩雷格瑞恩·沃斯特豪恩 (Peregrine Worsthorne) 在为社会等级制辩护中提供了一个解释线索：

社会等级制在英格兰发展了几个世纪……从社会上层到社会最底层都对此感到相当满意，每一个人都明确知道其社会中的地位并因此都会舒适得多 [13]

他说道：“等级制本身并非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被认为是天然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他利用了自然观念和“自然性”背后的巨大力量作为立法者。如果我所做的和喜欢的是合乎自然的，它就是正义的或必须接受的，即使它不被别人喜欢。反之，如果我不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例如同性恋或平等主义，我可以通过标识它们为“非自然的”而拒绝它们的价值。

人性从两个方面起作用。我们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信仰什么和为什么信仰——可以建立在内心关于人性特征的不同感受之上。^[14]反之，如果我想证实我的意识形态高于其他的，我将尽力证明它符合“人性”。

保守主义者尤其喜欢根据自然观念和自然秩序来进行合法性论证。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说过：人从一出生就自然地想得到他们所渴求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他们将会使全世界都敬畏和服从他们。这就证明了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所主张的社会控制是正确的：“个体的激情应该被压制，人的性格偏好应该经常被他们自身之外的力量制约。”

自然性也辩护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非理性信

念，即认为土地应该被当作私人财产而不是被公共占有，“一种绝对的、不可简约的需要”从本性上讲“根置于自然”。^[15]保守主义者进一步论证了许多绿色分子坚信的观念：自然是或应该是人类社会的模型。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坚持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的动力——为稀有资源进行的竞争和斗争导致强者生存并因而丰富了整个物种——也可以促进人类社会趋于完善。因而，我们需要保护、不干涉“自由市场”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斗争。一般来讲，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往往忘却他们论证的循环性。不言而喻，达尔文的进化“规律”首先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人类社会的观察结果中获取的。因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实际上是社会斯宾塞主义者。^[16]

现代社会生态学也趋向于以这种方式进行论证。社会生物学家比如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和德斯芒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强调侵略和竞争的天然性，提出在文明外表的背后，我们都是自私的“原始人”。里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悖常理地坚持认为，表面上看利他性的行为实际上也来源于对自我利益的考虑，而当右翼思想家纠住他的理论不放时，他感到非常苦恼。^[17]

左翼理论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其中之一是关于自然是人类社会的模型的观点，但那种自然从本性上说是合作性的。这就是克鲁泡特金著名的相互帮助理论(参见第四章第三节)。绿色分子像卡普拉(F. Capra)经常赞同这种观点。其他一些人比如罗斯(S. Rose)、卡明(R. Kamin)和莱万廷(L. Lewontin)批驳了智力是天生的等观点的相关证据的科学，并主张一种“天性”与“教化”之间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其中一方总是影响着另一方。^[18]

这种发展成为一种关于人性本质的社会性的论点，认为人性可以通过改造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来形成：

人类所有品性，从最好到最坏的，从最无知到最有知的，都可以在任何共同体甚至全世界产生。^[19]

威廉·莫里斯尽管拒绝了欧文建立“理想共同体”的方法，却采纳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即认为人性是可以塑造的而不是天生注定的，因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阿特金森这样归纳了关于人性争论的真正本质：

英国人有关人性与社会结构的假定必然体现为社会等级关系上的共同认识，这虽然经常地被作为英国社会理论的本质性“发现”〔霍布斯、休谟（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理论〕，却不过是被文化偏见所强化的文化偏见。^[20]

阿特金森进一步主张，人性不是社会改进的障碍。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的、并且对于绿色分子而言也是关键性的观点，绿色分子的确很想彻底地改进社会：

其他社会是围绕着不同的文化假定组织起来的，而且历史不断地证明：文化假定和组织安排上的变化确实发生过并且是可能发生的。

因而，与如果人性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应当如何做的问题相比较，关于人性“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绿色分子在后一问题上花费了太多精力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例如，我们从本质上说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着边际的闲扯。资本主义经济明显是在自取灭亡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件高度合作性的事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不得不同意承担他们现在的角色，接受资本主义的目标作为经济和

文化的规范：这可以“从存在于战后美国工厂中工人（与老板）深厚的合作性情感中”得到佐证。^[21] 重要的是，我们奉献我们合作性能力的目的是什么。

这种人性探求中也有一些困境。比如，绿党坚持认为土著民族是一个生态健全的“自然社会”（例如美国印第安人）。但是，这种“高贵的野蛮人”的观念和人性本身的概念一样是意识形态化的和依从于历史时尚的。人们往往在这样的“传统社会”中寻找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22]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

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以集体方式或个体方式——自由地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与经济安排以及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与哲学问题。正如对人性的观点一样，被假定为外部力量决定的对人类行为的限制——比如经济或历史的“规律”、上帝的设计、技术进步或物理环境——都可以强有力地使现状合法化。声称我们被外部力量决定便是在潜在地主张，与这些力量不合拍的变革即使可能也是不明智的。这一观点也可以用来暗示，我们必须忍受我们并不喜欢的社会特征（例如失业），因为这些特征多来自于政府无法控制的力量（如经济规律、世界经济衰退）。

因而，这看起来好像是反对任何希望激进社会变革的群体的利益而支持决定论者（因而或许是宿命论者）的观点，而不是一种人类能自由地建构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看法——借用马克思的话：“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一般来说，社会主义者回避这种争论。然而，绿色分子有着接受环境（资源）方面的直接限制和决定人类活动的传统。^[23] 他们因此而批评经济和人口的无限增长。

这是一种环境决定论模式（与基因遗传的生物决定论人性观相反）。环境决定论以多种形式出现，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限制理论到早期地理学家的如下观点^[24]，它认为：人性、相貌特征、民族和社会特征或多或少地由气候、土壤、地势和地理位置决定（目前，这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既成的环境决定人的特征和本性的观点在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公社到 20 世纪城市规划和建筑的社会设计尝试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大量技术中心论者和自由市场倡导者往往反对增长极限理论^[25]，强调培根的科学知识就是相对于自然的力量这一信条，认为这种力量可以通过扩大自然界“限制”的边界来改善人类命运。一方面，他们的论证同样是决定论的，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足够的因果规律知识来影响自然界的形式和行为，这种规律决定着自然界各要素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被视为是支持人们意志自由——自由地支配外部环境——的观念。实际上，这些观点的必然结果是，自然界是外在于或分离于我们的，以及自然界就像是一台机器。^[26] 深生态主义者明显地排斥这种思想。

在社会和自然关系上强调人的意志自由的少数西方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中已经演变成成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现象学假定，我们既不是从世界其他部分中分裂出来的，也不是由“外部”力量预先决定的。实质上，现象学强调我们改造世界的方式：经由我们的意识把结构、意义和价值强加给世界。这并不是要否认一种“客观的”自然的存在（尽管更极端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如乔治·柏克莱（George Berkeley）和新时代主义（New Ageism）的一些人确实认为，物质纯粹是精神活动的体现）。^[27] 但它想指出的是，这并不真正重要。^[28] 世界上重要的知识是个人和群体的意识和意图如何被解释、传递和结构化。

既然意识和观念在个体和群体之间是不同的，这种科学强调通过直觉感悟来认识世界的主观性方式。因此，不同的人和文化群体如何认识和理解他们直接经历到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世界”——是重要的。实际上，这提出了一种认识、理解以及世界应当如何的道德观方面的相对论观点。它蕴涵着，不同个体和群体的知识都应视为同等重要和有效的。

通过扩展，个体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除了我们的出生和在某一天死去，没有客观的外在事实和规律支配着我们的社会存在。我们不是历史力量或社会规律和行为规则的无助的玩物。我们对我们的许多方面有着控制和选择，并不受经济和社会习俗所约束。这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文化、社会和经济限制着我们所处的地位。但是，“限制”并不意味着“决定”。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我们已被抛进一个并非由我们所创造的世界中；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自由地解释那个世界对于我们的意义，而不是由其他人或被假定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来解释。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将会导致一种异化的和“不真实”的存在。而且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打开了广泛实现的可能性，包括人们依据其希望成为的样子而被创造。存在主义包含着我们与别人及自然之间关系中的各种意蕴。尽管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学说，但它的确主张，既然我们可以自由地改造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所体验到的世界——污染和社会不公——也是我们的造物，因而我们应最终为其负责。

自由意志哲学家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强烈的政治联系（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与他们在意识与观念领域来探讨这一问题的方式不同，马克思主义尤其关心的是这一领域如何与物质领域相关联，特别